

基于文本类型理论的隐喻翻译策略研究

◎王文莉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隐喻是人类赖以生存、思维、感知的重要方式，各类隐喻普遍存在于各类文本中，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着不同的价值。隐喻翻译在不同文本中的处理尤为重要，如有些图式隐喻已慢慢固化，在翻译时可选择直译；表情类文本中的隐喻承载着作者的丰富情感体验，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在翻译这类文本时应在极大程度上保留原有隐喻；而信息类文本和呼唤类文本注重传递真实信息，保留隐喻的必要性应视情况而定。本文从隐喻类型和文本类型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隐喻在不同文本中的翻译处理，尝试为隐喻的翻译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隐喻翻译；翻译策略；文本类型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0-010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0.034

一、引言

隐喻就是用人们比较熟悉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概念，莱可夫和约翰森于1980年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并指出隐喻是“语言和社会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和基本的方式”。这掀起了一场隐喻革命——隐喻不仅局限于传统修辞学中的语言词汇问题，更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的认知也不同，使得隐喻具有跨文化特性，这一点在翻译中尤为明显。

对于译者来说，单个的长句中的隐喻的确很有启发性，但是译者首先需要判断文本类型，根据文本类型确定全文的基调。以基本感官为基础而生成语言隐喻一般文学价值较小，在英汉转换时也无大障碍，因为它们的隐喻基础是无文化差异的，如上下、左右、内外、高低等。然而，那些依靠常见事物为源域概念的隐喻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创作者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隐喻的使用也不一样。因此，文本类型因素是译者翻译隐喻的重要因素。

二、理论介绍

(一) 隐喻的定义

隐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喻他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①通俗来说，隐喻指人们用比较熟悉的事物来表达较为抽象的概念，利用具体、熟知的事物来描述、判断或推理抽象、陌生的事物，从而创造一种感染力，使表述新奇、生动和形象。

隐喻有三个要素，具体熟悉的事物被称作源域(source domain)，抽象概念被称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源域

到目标域的过程叫映射(mapping)。传说有一次学生问亚里士多德“*What is life*”，他思考片刻说“*Life is a stage*”。“*Life is a stage*”，此处的stage是源域，life是目标域，把stage比作life的这个过程叫映射。

(二) 概念隐喻

莱可夫和约翰森在于1980年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认为隐喻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②。那么如何从普通的英语跨越到概念隐喻？

段落文字中一些词组词汇中的隐喻只是零散的语言现象，比如a good start, going through, reach the end of等。“生活”本身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而start、going、reach这些动词是基于journey这个概念的，表开启（一段旅程）或结束（一段旅程）。这些词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表示道路的词组，而“LIFE IS A JOURNEY”就是这些词组共同的概念隐喻，概念隐喻就是语言隐喻背后的统领。

再举一些中文例子，“黄昏岁月”，这句话显然使用了一个语言隐喻（黄昏），这是由于思维里已经存在一个概念隐喻“LIFE IS A DAY”；“我在一个月内写完了论文。”其概念隐喻是“TIME IS CONTAINER”，此句的“在……之内”是把抽象的时间概念当作一个三维容器。

概念隐喻理论使传统隐喻理论从修辞学转向了认知，认知隐喻观提出隐喻在修辞功能之外的认知功能。

(三) 文本类型理论

以德国学者莱斯和英国学者纽马克的理论为主。莱斯根据语义功能划分为三种文本类型：1.以内容为主的文本（反映事实，传递信息）；2.以形式为主的文本（通过艺术形式来展现内容，如文学作品）；3.感染为主的文本（广告、

布告和宣传类文本)。

纽马克根据语言功能划分为三类文本:1.表达类文本(文学作品、权威发言、自传等);2.信息类文本(描述客观事实、习语和比喻);3.呼唤类文本(号召读者行动、广告等)。

三、关于隐喻翻译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后,认知隐喻被正式确立为一个值得深思的翻译领域。首当其冲的是隐喻的可译性问题,这是学界早期开展隐喻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1976年,Dagut在Can“Metaphor”Be Translated?^③中就质疑了隐喻可译性问题的单一性论断,主张这是因为没有合理确定隐喻复杂的本体因素所致。Broeck则认为人不能准确译出所有的隐喻,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981年纽马克在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中提出“翻译中最特殊的就是隐喻翻译,即使英语语言中的四分之三都是使用隐喻语言”,并随之提出了七种隐喻翻译策略,包括:1.在目的语中重新呈现相同喻体;2.用目的语中的喻体对源语喻体进行替换;3.隐喻转为明喻;4.利用明喻和本体相结合以翻译隐喻;5.隐喻转换为本体;6.省略隐喻;7.结合隐喻和本体。

1995年Mandelblit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隐喻的翻译可以从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映射条件相同或不同的两个方面考虑^④。但是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源语和目标语之间映射条件相同时,是否采用和原文隐喻相同的译法仍需斟酌。

Kovecses的隐喻翻译观点则更加全面,他提出的翻译策略是:在隐喻的映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原文隐喻相同的词汇表达和不同的词汇表达;映射的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词汇表达和不同的词汇表达^⑤。

国外学者大都是从源域、目标域和映射过程的对等总结隐喻翻译策略的,也就是将奈达的对等理论应用于隐喻翻译之中,提出了认知对等的概念;同时亦有学者把目的论的框架运用到隐喻翻译中,尝试从翻译目的的角度研究隐喻翻译,认为根据不同目的,原文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译文,隐喻翻译中应把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考虑在内。

(二)国内研究综述

中国学界关于隐喻翻译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对Newmark的理论研究开始的,张培基于1980年在其著作《英汉翻译教程》中提及了翻译隐喻的方法;2009年刘冰泉等在《英汉互译中的认知隐喻翻译》一文中研究了汉英之间的修辞隐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词对词直译和平行转移的翻译策略^⑥。

和西方学者一样,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依托已知的翻译理论为框架展开隐喻翻译研究的,如2011年黄丽媛等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隐喻翻译的指导作用并提出了一些翻译策略;2014年雷晓峰等基于语用顺应理论尝试性地设计出了隐喻翻译模式,提出通过动态化地顺应源语

和译入语文本内外语境因素,通过顺应性选择,译者能译出满足交际功能与目的的隐喻译文。

另外,隐喻的专题研究对隐喻的翻译也有一定发展,主要包括人体隐喻、结构隐喻和战争隐喻等,2009年黄国文指出了颜色隐喻翻译有转换意义和直接表达两种方法,并就颜色隐喻的翻译进行了隐喻解读的实证研究。在如今跨学科的大背景下,隐喻翻译与各种现有的翻译理论相结合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

四、隐喻类型与翻译

(一)意象图式隐喻

由全人类共有的感知图式构成的隐喻称为意象图式隐喻,如上下、内外和冷热等。图式和人体体验相关,是我们用概念隐喻感知抽象世界所需要的媒介。这类隐喻非常之多,比如:I am out of trouble. (based on IN-OUT schema)和The price is high. (based on UP-DOWN schema)人们一般不认为这样的句子里有隐喻,因为实在太普遍,在传统隐喻理论中它们不是隐喻,但在认知隐喻理论中它们是隐喻。

在各类文本翻译中,意象图式隐喻基于人类共同的人体感知,人体感知无文化差异,在跨文化过程中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一般不保留其翻译,直接略译。比如I am in love,此句的概念隐喻是LOVE IS A CONTAINER,是基于人体感知的容器隐喻,翻译时可译为“我在恋爱中”。

(二)意向隐喻

意象隐喻则不是普通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直接地映射结果,而是将一整个图像映射到另一个整体图像上。比如刚看完一场走秀后,抬头看见树上有一截弯曲细长的树枝,会把弯曲的树枝和模特瘦长的身形结合在一起,可以说“The model is just a twig”,此处是把树枝图像投射到模特身上构成的隐喻。同理的例子还有“My wife’s waist is an hourglass”,我太太的腰身像沙漏一样。在翻译中,由于文化背景造成的认知差异,意向隐喻引入映射的源域具有潜在的文化特异性,比如用一种别人没有见过的动物作为源域映射的基础,别人可能无法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流时,意向隐喻的出现可能造成一些障碍,但是往往这类隐喻承载的信息具有较大的文学价值,常出现于文学作品中。

五、隐喻翻译在不同文本中的处理

了解文本类型是翻译要做的第一件事,不同的文本翻译手法不一样,比如电影《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就翻译得极具效果,隐喻完全体现;但是如果直接翻译,“卧虎藏龙”这句话则应译为“talents”。

(一)翻译中隐喻与文本的关系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的形式特征,需先理清其价值,以基本感官为基础而生成的语言隐喻在各类文本中都随处可见,在英汉转换时无大障碍,因为它们的基础是无文化差异的,比如“上下、左右、内外、高低”等以方位词为映

射条件的意向图式隐喻。然而,依靠常见事物为源域概念的隐喻并非如此,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对事物的认知也不一样,人们对源域和目标域的选择,以及映射过程的认知不一样。比如 we are at a crossroad 这句话译为“在十字路口”,是基于“LIFE IS A JOURNEY”这个概念隐喻的,但如果译为“我们该做决定了”则放弃了原来的隐喻,此类隐喻有时在文学文本中会保留。

(二)文本类别与隐喻翻译

文本类别是隐喻翻译处理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根据纽马克的文本分析理论^⑦,可根据语言功能将文本分成三个大类:1.表情类文本,包括文学作品、演讲声明和私人写作等;2.信息类文本,包括新闻报道、教科书和科技文章等,其实大多数非文学作品都归为信息类文本;3.呼唤类文本,包括广告宣传、通知和说明书、规章制度等。这三种文本中的隐喻翻译需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1. 表情类文本中的隐喻翻译

在翻译文学作品等表情类文本的时候,需要多关注隐喻现象,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一般承载着较强的文化信息,淡化隐喻的翻译会失去其文学性。所以文学作品里的隐喻一般采取直译,直接翻译出源域和目标域,保留文本的文学性。比如“Difficulty is the nurse of greatness—a harsh nurse, who roughly rocks her foster-children into strength and athletic proportion.”这里将“困难”比喻成了保姆,用一个社会中的某种职业作为隐喻中的源域,这不是泛滥的意向图式隐喻,而是文学家精心打造的隐喻,是作者头脑中的一个智慧闪现,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采用直译的策略。

2. 信息类文本的隐喻翻译

新闻报道、教科书等信息类文本的翻译应多注重信息传递通畅,原文结构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因此信息类文本中的隐喻翻译无大必要直译,一般省略不译。新闻报道里往往有着大量的隐喻,且类型繁多,多为战争隐喻,结构隐喻、颜色隐喻和空间隐喻等。比如纽约时报一则报道中写到“The Republican Party watered this tree of racism; it’s now grown to maturity and it’s dropped this fellow David Duke from its branches.”这句话的隐喻是把抽象的种族歧视比喻成一棵树,背后的概念隐喻是 IDEAS ARE PLANTS, 整句译为“共和党过去为种族歧视这棵树勤浇水。现在这棵树成熟了,还从树枝上掉下大卫杜克这个果实”。此处直译隐喻并不会对读者造成什么障碍,即使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可以读懂,具有较强的跨文化穿透力,还增加了讽刺意味。

信息文本中,在保证传递信息的前提下,可直译隐喻,以增强文章的吸引力。

3. 呼唤类文本的隐喻翻译

广告是最典型的呼唤类文本,其翻译多注重读者。有时为了达到和原文一样的广告效果,翻译此类隐喻时会突

破原语的文化背景。所以呼唤类文本的翻译也大部分采取省略不译的策略,但宣传卖点时的隐喻翻译则例外。

比如: Is your money taking you where you want to go? — Get there.

阁下的投资是否更上一层楼? ——登峰造极

这句广告中的隐喻显然是将投资当作是旅程 (INVESTMENT IS A JOURNEY), 而译文没有使用原文的隐喻结构(把你带你想要去的地方), 因为若按照这样的译文则缺少与读者的共情力, 淡化了广告需要的效果。

综上, 文本类别是隐喻翻译的重要基础之一。表情类文本倾向于接受隐喻, 人体感知为映射条件的基础隐喻, 意象图式隐喻和意向隐喻都可采取直译手法保留隐喻。但在信息类文本中, 隐喻的翻译处理并不重要, 而呼唤类文本的隐喻则可以较为自由地处理, 因为这类文本偏向于起宣传作用, 本身的文学价值较低。

可用图表总结如下:

文本类型	Expressive 表情类	Informative 信息类	Vocative 呼唤类
保留隐喻的必要性	1. 很有必要 2. 意向隐喻最有必要 3. 意象图式隐喻次之 4. 感知隐喻更次	1. 无大必要 2. 意象隐喻和图式视语境而定 3. 感知隐喻无必要 4. 总体不体现	1. 一般不考虑 2. 仅在“卖点”上保留 3. 总体无必要

六、结语

隐喻是人类赖以生存、思维、感知的重要方式, 普遍存在于各类文本中。隐喻和翻译也息息相关, 隐喻的翻译研究有多个方向选择, 首先可以把认知隐喻和已有的翻译理论结合起来, 比如认知隐喻和对等论的结合, 衍生出认知对等这一新视角。其次, 可以把隐喻分类, 可分为意向图式隐喻和意向隐喻, 意向图式隐喻由于其普遍性可以忽略不译, 意象隐喻由于文化的不同需要直译。最后, 可以根据不同类别的文本判断隐喻的价值, 选择合适的隐喻翻译策略, 一般表情类文本中的隐喻富含文学价值, 需要保留翻译; 信息性和呼唤类文本需要传递真实的信息, 更多面向于目标语读者, 所以应依照具体情况而定。

本文从隐喻类型和文本类型的角度出发, 讨论了隐喻的翻译策略, 希望对后续的隐喻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帮助。笔者还认为可以从专题隐喻入手来研究隐喻翻译, 比如经济新闻中常用的结构隐喻和战争隐喻等, 可以给隐喻翻译提供一条新思路。

注释:

① 亚里士多德著, 陈中梅译:《诗学》,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②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J].

Ethics, 1980, 19(2): 426-435.

③Dagut, M. Can "Metaphor" Be Translated? Babel, 1976, 22(1), 21-33.

④Al H.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Metaphors, 2007.

⑤Kovecses Z. Metaphor in Culture, 2005.

⑥刘冰泉, 张磊:《英汉互译中的认知隐喻翻译》,《中国翻译》2009年第04期,第71-75+95-96页。

⑦Tinsley R L,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4, 67(2): 210.

参考文献:

[1]Newmark P.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J]. Babel, 1980, 26(2): 93-100.

[2]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J]. Ethics, 1980, 19(2): 426-435.

[3]肖娟. 关联理论下隐喻口译研究[D]. 中南大学, 2013.

[4]程同春. 英语隐喻的思考与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02): 36-40.

[5]郭薇雅, 朱宝锋. 概念隐喻视角下《围城》中“人”的隐喻英译探析[J]. 今古文创, 2023, (17): 112-114.

[6]雷晓峰, 田建国. 语用顺应论框架下的隐喻翻译模式研究[J]. 外语教学, 2014, 35, (02): 99-103.

[7]刘法公.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8]孙毅, 李玲. 隐喻翻译研究在中国(1995-2018)——一项基于文献统计的考察[J]. 外语与翻译, 2019, 26(02): 7-18+98.

[9]王婵. 纽马克翻译理论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体现[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8(02): 3.

[10]王婵. 纽马克翻译理论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体现[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02): 138-140.

[11]叶静文. 近20年来国内隐喻翻译研究综述[J]. 英语广场, 2020, (34): 25-28.

[12]叶子南. 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3]张慧. 论英文广告中隐喻的翻译[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作者简介:

王文莉, 女, 江西赣州人,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商务英语研究专业, 研究方向: 翻译与实践。

(上接第105页)

笔者认为, 上述四个例子中, 皇后违反数量准则, 提及了两遍选秀的事情, 日文也可直接用疑问句表达, 凸显重复出现的话语。面对夏冬春的质问, 安陵容吞吞吐吐, 翻译时将其表现出来更佳, 不过影视剧有视听的补充, 不作调整也无伤大雅。其他两个例子由于中日文化差异, 翻译上存在较大的障碍。皇后用反语训斥齐妃, “好东西”一词在中文中根据语境的不同会呈现截然相反的意义, 但是日文中没有这样的表达习惯, 所以舍去了。“莲子”与“怜子”同音不同字, 通过强调“莲子之心”来传达言外之义“怜子之心”, 但日文「蓮の芯」与「子を案ずる心」既不同音也不同字, 出现不可译现象。

由此可见, 合作原则对日版《甄嬛传》字幕翻译具有指导意义。对于言外之义的翻译, 我们首先要分析会话违反了合作原则的哪一条准则, 再结合中日文化差异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 以便译文取得成功, 使得我国的优秀影视剧更好地走向海外。

参考文献:

[1]Grice, H.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J]. 1975.

[2]贾利利. 基于合作原则违反的《甄嬛传》会话含义分析[J]. 现代交际, 2021, (06): 85-87.

[3]姜望琪. 格赖斯语用学再探——《逻辑与会话》翻译心得三题[J]. 当代修辞学, 2020, (03): 1-10.

[4]刘倩. 从合作原则看中国电视剧中“言外之意”的日语字幕翻译——以日文版《后宫甄嬛传》为中心[D]. 天津师范大学, 2018: 59.

[5]刘晓辉, 张亮. 影视剧字幕翻译及跨文化传播——以美版《甄嬛传》为例[J]. 出版广角, 2017, (06): 64-66.

[6]李运兴. 字幕翻译的策略[J]. 中国翻译, 2001, (04): 38-40.

[7]莫爱萍. 语用与翻译[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8]钱绍昌. 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 中国翻译, 2000, (01): 61-65.

[9]沈家焯. 语用·认知·言外义[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 (04): 8-10.

[10]史雅静. 解读《后宫甄嬛传》中的皇后形象[J]. 电影文学, 2014, (23): 55-56.

[11]王健平. 论合作原则及其准则[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01): 182-188.

[12]周杰. 从《甄嬛传》的美版字幕看电视剧译介生态伦理[J]. 当代电视, 2016, (03): 29-30.

作者简介:

方可嘉, 女, 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笔译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